

二十世紀中國翻譯史研究的起承轉合(上)

鄒振環

(復旦大學 歷史系, 上海 200433)



[摘要]翻譯活動在中國有着近三千年不間斷的歷史，形成了深厚的翻譯傳統，留下了數量巨大和內容豐富的翻譯文獻。但將這一翻譯活動的演變作為一種獨立的研究對象來進行考察和研究，始於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的《譯書略論》。民國時期蓬蓬勃勃的翻譯史研究承接清末發軔的中國翻譯史研究，注意介紹和借鑒國外翻譯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形成了中國翻譯史研究的多角度、多學科的特點。20世紀50—70年代，兩岸三地的翻譯史研究發生了重要的轉折，在大陸處於研究低潮的階段，臺灣、香港地區的學者仍然承繼了民國時期的學脈。20世紀70年代末，大陸的翻譯史研究再度興起，並在1984年後走向高潮，顯示出研究的多元格局。不僅有翻譯文學史、科學翻譯史、翻譯理論史、翻譯出版史、翻譯教學史，以及宏觀視野下的翻譯文化史；也有區域翻譯史、口譯史，以及以譯書為中心的翻譯史、譯者為中心的翻譯史、譯事為中心的翻譯史、翻譯形式為核心的專題翻譯史論文集。中國翻譯史研究在經歷了起承轉合後，終於在20世紀末形成了兩岸三地多元研究的新格局，學術界逐漸有了愈來愈多的學術共通話語，為21世紀中國翻譯史從復興走向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存在的問題是，自20世紀初以來的中國翻譯史研究，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方法論上，一直沒有形成自己的一套話語系統，基本上仍處在政治史分期、文化史編纂、比較文學理論的陰影下，翻譯的內部史和外部史研究的方法仍需探索，翻譯史尚未形成屬於自己學科的獨特的文獻學。

[關鍵詞]20世紀 中國翻譯史研究 起承轉合

[作者簡介]鄒振環（1957—），男，祖籍浙江省鄞縣（今寧波市鄞州區），出生於上海；1985年在復旦大學歷史系取得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99年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德國埃爾蘭根-紐倫堡大學漢學系客座教授（2001）、日本關西大學訪問研究員（2003—2004）、關西大學“亞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言語文化班共同研究員（2005—2010）、臺灣政治大學訪問教授（2010）、臺北故宮博物院訪問研究員（2011）、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訪問教授（2012）、臺灣清華大學客座研究員（2014）；現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主要從事明清以來西書中譯與中國文化關係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20世紀上海翻譯出版與文化變遷》、《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1815至1900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晚明漢文西學經典：編譯、詮釋、流傳與影響》、《疏通知譯史》等。

The Starting, Reinforcement, Transition and Conclusion of Study on China's Translation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I)

Zou Zhenhu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433)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China originated very early. With an uninterrupted history of nearly 3000 years, China has formed a strong tradition of translation and left tremendous translated literatures rich in content. However, it was not until the appearance of *Yi Shu Lue Lun* in 1902 that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were evolved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object for observation and study. The thriving study on translation histor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herited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history in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introduced and drew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from studies on foreign translation history, which formed the multi-angle and multi-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translation history. In the 1950s to 1970s, a big transition of the study on translation history took place in the Mainland, Taiwan and Hong Kong, during which the Mainland was in its research depression while the scholars from Taiwan and Hong Kong still inherited the learning tradi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late 1970s, study on translation history rose again and reached its peak in 1984, which showed a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research including not only translation history of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literary, science, theory, publication, teaching and culture in a macro perspective, but also history of regional translation and oral interpretation, as well as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centered at translated books, translators, event translation and symposium of featured translation history with translation pattern at core. After experiencing the starting, reinforcement, transition and conclusion status, the study of China's translation history eventually formed a new situation in the three regions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more and more academic common discourse thus emerged among the academic circle,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hina's translation history from renaissance towards prospe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existing problem is that 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study of China's translation history has not formed its own set of discourse system neither in theoretical aspect nor methodological aspect. Basically it is still under the shadow of different stages of political history, compilation of cultural hist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ies. The methodologies for studying bot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need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hence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has not formed a unique philology which belongs to its own discipline.

Keywords: 20th Century; study of China's translation history; starting, reinforcement, transition and conclusion

Author: Zou Zhenhuan earned his Master's Degre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Fudan University in 1985 and assumed a teaching position in the same university. In 1999, Prof. Zou earned his doctoral degree in history. Currently he is the doctoral tutor and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Fudan University, and has been affiliated to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s an Honorary Research Fellow since 2009. Prof. Zou is one of the very few historians who works on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on Chinese cultural relationship. His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include *A Hundred Translated Works that Affected Early Modern Chinese Society*,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Western Geography Books in Late Qing China*,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lation Publishing in Shanghai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the Import of Western History to Late Qing China*, *Classical West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in the Late Ming: Translation, Commentary, Circulation and Influence and Dredg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etc.

翻譯活動在中國起源很早，《周禮》和《禮記》中都有關於周王朝翻譯活動的記述，當時的“翻譯”大多是指從事翻譯的工作者。有學者將“翻譯”界定為近現代纔出現的一個新詞^①，實為大謬。儘管翻譯活動在中國有着近三千年不間斷的歷史，形成了深厚的翻譯傳統，也留下了數量巨大、內容豐富的翻譯文獻，但將這一翻譯活動的演變作為一種獨立的研究對象來進行考察卻是在20世紀初纔出現。由於中國的歷史學研究比較注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之龐大的歷史敘事，翻譯史研究屬於專門史之一科，可謂邊緣之邊緣，導致近年來一些關於20世紀中國歷史學回顧的論著或者忽略翻譯史這一門類，或者局限於近期出版論著的分析。鑑於此，本文嘗試運用“起承轉合”^②的解說方式，對20世紀初中國翻譯史研究的起步、發軔，如何經過民國時期的承接、承勢，至1949年後的演變、轉折，並在20世紀末完成了兩岸三地匯合、會聚的演變過程，作一番專門史的初步考察。

一、20世紀初中國翻譯史研究的發軔

20世紀初，關於中國翻譯史已經有了若干研究，但多屬於零星的分析。這裏主要討論1902—1949年中國翻譯史研究的發軔和早期演進過程。

（一）發軔時期的《譯書略論》

清光緒六年五月（1880年6月），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 Fryer, 1839—1928）在《格致彙編》第三年第五卷發表《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一文，就翻譯西書的源流、方法和成效，所譯書目等，對1860—1880年間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出版物作了總結；由於該文為親歷者的敘述，係翻譯史史料，尚不屬於研究的篇什。最早有關翻譯史研究的論文，要算連載於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二至十三日（1902年10月13—14



《中外日報》

日）《中外日報》上佚名的《譯書略論》。這篇兩千多字的文章首先討論了漢明帝（公元57—75年在位）以來的佛經翻譯，指出當時參與翻譯的既有華人，也有胡人，宗派大小乘無定，“文筆則華朴繁簡無定，其譯書則一書二譯三譯甚至六譯亦無定。而自其大勢觀之，則其哲理由淺而漸深，其文字由疏而漸密”。該文討論的重點為明以後的譯書，第一次把明末至清末的翻譯史劃分為四個時期，標明了每個時期所處的時代、所譯之書、譯書之人、譯書之地、譯書之宗旨、譯書之經費，並簡要分析了每個時期的譯書特點。第一期為晚明時代，所譯之書為宗教和算學，由於傳譯過程中上無國家保護，下有社會阻力，因此稱為“犯難譯書時代”；第二期是咸豐年間，所譯之書為天文和算學，中心在上海墨海書館，譯書經費主要來源於教會，李善蘭（1811—1882）等士大夫因譯書而獲得巨大榮譽，因此稱為“名譽譯書時代”；第三期為同治至19世紀末，所譯之書先後為格致工藝、算學、物質學、歷史、政治，中心在江南製造局、京師同文館、上海益智書會和廣學會、廣州博濟醫院等，譯書經費主要來自國家和教會，由於在公局中都能獲得薪俸，故稱“薪俸譯書時代”；第四期為20世紀初年起，所譯之書主要為政治學，譯書之人為士大夫和學生，譯書之地在“各大市場”，譯書宗旨是“輸入文化挽救衰亡”，譯書經費是“人民自備”，由於受市場的

^① 黃河清編：《近現代辭源》（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第204頁。

^② “起承轉合”原用於解說詞、賦、曲、散文、小說等之結構，清代學者劉熙載《藝概·文概》中稱：“起、承、轉、合四字，起者，起下也，連合亦起在內；合者，合上也，連起亦在內；中間用承用轉，皆顧兼趣合也。”起承轉合之間的關係，起中有合，合中有起，強調的是首尾呼應，而“承”與“轉”兼顧“起”與“合”，為闡述之上下勾連，一脈相承，所以四者之間的關係是互相依存和互為作用。



支配，特別是迎合了科舉市場的需要，其編譯目的“非開民智也，賣夾帶也”，因此稱爲“夾帶譯書時代”。指出前期譯書之人是教會和朝廷，目的爲傳教和敷衍，後期譯書之人爲士大夫和學生，譯書的目的爲謀“公利”和“私利”，因此“後譯之力，當萬倍於前譯之力，前譯者爲東方之啓明，而後譯者爲經天之烈日；前譯者爲昆侖虛叢林灌莽中之涓流，而後譯者爲江河入海處吞天之巨浸”。但從質量上考察，後譯之書不如前譯之書，理由是：前譯取自西文，後譯取自東文；前譯多科學，後譯多泛論；前譯多巨帙，後譯多短書。從而感歎，西人凡事日進，而華人凡事日退，器用製造無不如此。^①該文雖然有不少錯誤史料和片面分析，分期及其命名也未盡合理，但作爲第一篇比較系統討論中國翻譯史的篇章，其意義實在不能低估。

（二）“翻譯文學”概念的提出及其運用

中國翻譯文獻中有數千卷從胡文或梵文翻譯過來的佛經，其本身就是偉大的文學作品。20世紀20年代，開始有學者嘗試從現代學術的視角來整理和研究佛典翻譯文獻。1920年，新史學的創導者梁啟超（1873—1929）計劃撰寫《中國佛教史》，先後寫下了《佛典之翻譯》、《翻譯文學與佛典》，後者還以《中國古代的翻譯事業》爲題刊載於1921年7月15日出版的《改造》雜誌。爲呼應翻譯史之研究，《改造》開出的“翻譯事業之研究”專欄，刊出鄭振鐸（1898—1958）的《俄國文學史中的翻譯家》、蔣百里（1882—1938）的《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翻譯事業之先例》等。這些文章儘管研究外國翻譯史和翻譯家，卻以有說服力的案例闡述了翻譯對於一個國家文學事業發展的重大意義，爲中國翻譯史研究提供了域外研究的借鑒。

1928年，上海新月書店推出了胡適（1891—1962）的《國語文學史》。該書上卷有關於“佛教與翻譯文學”的章節，以生動的語言描繪了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巨大作用。由於胡適在文學史研究上的巨大影響，或以爲胡適是中國“最先提出翻譯文學問題”的學者^②。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在中國最早提出“翻譯文學”概念的是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一文^③。梁啟超在該文中已經比較系統地討論過“佛教輸入以前之古代翻譯文學”等問題，並在該文中最早提出了“譯學”的概念^④，指出：“欲察譯學之進步，莫如將同本異譯之書爲比較的研究。”在“翻譯文學之影響於一般文學”一節中指出，翻譯佛典文學對於中國文學的影響體現在國語新詞語的擴大，引發了漢語語法及文體的轉變，以及文學情趣的發展。^⑤雖然“翻譯文學”一詞在中國學術界出現得很早，但什麼是“翻譯文學”，民國時期的論者並無清晰的認識，至今仍有爭議。^⑥

陳子展（1898—1990）是20世紀較早重視研究近代文學並撰寫著作的少數幾位學者之一。1928年春，他應田漢之邀，在上海南國藝術學院講授“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一課；1929年4月，以“陳炳堃”署名將《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一書交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首先將“翻譯文學”寫入中國近代文學史，專門列出“翻譯文學”一章，討論了嚴復（1854—1921）、林紹（1852—1924）、馬君武（1881—1940）、蘇曼殊（1884—1918）

① 張靜廬輯註：《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第6冊，第60—65頁。

② 羅選民主編：《外國文學翻譯在中國》（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3），第4頁。

③ 王向遠：“翻譯文學史的理論與方法”，《中國比較文學》4（2000）：46—56。他認爲，“翻譯文學”這個漢字片語是日本人最早提出的，起碼在20世紀初日本就有人使用這個概念了。梁啟超使用這個概念是受到了日本文學的影響。不過，王向遠並未說清楚梁啟超具體是通過什麼渠道受影響的。

④ 方夢之在《我國早期的翻譯學——簡評蔣翼振的〈翻譯學通論〉》一文中認爲，“譯學”這樣的術語在我國現代翻譯史上並不陌生，最早見之于1927年蔣翼振編著的《翻譯學通論》〔方夢之：《譯林夕照》（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第145—151頁〕。這一判斷，將“譯學”這一術語在漢文文獻中出現的時間推遲了五年。

⑤ 梁啟超：《中國佛教研究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8），第81—134頁。

⑥ 關於“翻譯文學”的概念及其爭議，參見謝天振：《譯介學》（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第169—206頁。



陳子展

等人的文學翻譯。該書是一本僅194頁的小冊子，但“翻譯文學”有31頁，佔全書篇幅的16%。1933年，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由北平傑成印書局出版。該書是作者1932—1933年間在太原山西省立教育學院講授新文學課程時所寫講義的基礎上整理加工而成。根據“自序”的說法，作者受到了鄭振鐸、馬季明（1883—1959）、郭紹虞（1893—1984）等人的指導。該書率先將“翻譯文學”的概念用於分析新文學，作者指出：“中國的新文學尚在幼稚時期，沒有雄宏偉大的作品可資借鏡，所以翻譯外國的作品，成了新文學運動的一種重要工作。”^①該書第七章專門討論“翻譯文學”，儘管篇幅不長，但討論了中國翻譯事業的沿革，內容涉及嚴復、林

紓、包天笑（1876—1973）、共學社、尚志學會、中華學藝社、少年中國學會、文學研究會、創造社、魯迅（1881—1936）、周作人（1885—1967）、李青崖（1886—1969）、趙景深（1902—1985）、魯彥（1901—1944）、鄭振鐸、郭沫若（1892—1978）、穆木天（1900—1971），並附錄“各國文學書中譯本一覽”，分別列出俄國、法國、英國、德國、日本、意大利、美國、波蘭、比利時、西班牙、古希臘、印度、奧地利、新猶太等國的文學譯本。^②由於在相對有限的篇幅內試圖對翻譯文學予以全面評價，導致不少屬於蜻蜓點水式的分析，但其中仍不乏作者獨到的見解。茅盾（1896—1981）曾批評作者在史料與觀點之間的處理上並不理想：“王哲甫先生這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一方面既然企圖下論斷，又一方面也想多多供給材料，兼有‘長編’的性質，他這用意是好的，就可惜他兩面都沒有做好；嚴格說來，實在有點糟！”其中“翻譯”一章，也被茅盾批評為是“記賬似的敘述了‘翻譯’有多少”，過於簡略。但同時茅盾還是肯定了該書作者的學術態度是忠實嚴肅的，遠不是那些搜輯別人的論文編成“論戰集”的速成科所能比。^③

翻譯文學的討論在20世紀30年代也進入了小說史的研究，如研修新聞出身的郭箴一所著《中國小說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一書，其中有大量對魯迅、胡適、鄭振鐸和趙景深等小說史論著和《小說閑談》部分內容的抄襲，但該書第八章民國部分的第三節討論了“新文學運動期間的翻譯文學”，力圖展示翻譯文學與新文學運動的關係，還是值得一提。其中對魯迅與周作人在翻譯文學上的貢獻有很高的評價，認為他們用直譯的“歐化語體”進行翻譯嘗試獲得成功，“為翻譯界開了一個新紀元，自此翻譯的質量就突然的進步起來了”；指出1928年之後，上海新開設了許多文藝書店，文藝雜誌也如“雨後的春草勃興起來”，於是文學的翻譯和創作一般都受到了出版界的重視，許多小書店在翻譯文學的出版方面，成績超過了“它們的老前輩商務印書館”。^④由於該書列入影響甚大的王雲五（1888—1979）主編的“中國文化史叢書”，也使“翻譯文學”的觀念在學術界有了更深一步的反響。

（三）早期翻譯史研究的三大家：鄭振鐸、賀麟與阿英

1924年第11期《小說月報》發表了鄭振鐸《林琴南先生》，1925年第21期《東方雜誌》刊載了賀麟《嚴復的翻譯》，分別對近代翻譯史上兩位翻譯大師林紓和嚴復進行了初步研究，拉開了近代翻譯家研究的序幕。這些研究雖然稱不上系統，但其中若干高屋建瓴的分析，使中國翻譯史研究在起始階段就有着一個很高的起點。賀麟（1902—1992）在論

①② 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北平：傑成印書局，1933），第259、259—280頁。

③ 茅盾：“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文學》4（1934），收入《茅盾文藝雜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上集，第474—480頁。

④ 郭箴一：《中國小說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下冊，第435—461頁。



文中推崇嚴復“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的觀念，提到自己曾有一個龐大的計劃，就是編寫一部由五章組成的《翻譯西籍小史》：（1）緒論，論研究翻譯史之旨趣及中國翻譯外籍之起源；（2）翻譯西籍發軔時期——明末清初之翻譯；（3）翻譯西籍復興時期——江南製造局及同文館之翻譯；（4）林紓、嚴復時期之翻譯；（5）新文化運動以來之翻譯。可惜，作者收集的一些材料和已經完成的林紓的翻譯一章在抗日戰爭中散失了，全書最終未能完成。

鄭振鐸在《林琴南先生》中指出了林紓的翻譯使許多人瞭解了關於西方世界的常識；由此也認識到歐美也有如中國一般的文學，有可與“太史公”相比肩的作家；最重要的還在於打破了中國傳統的以小說為“小道”的舊觀念，開了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風氣。該文被學術界公認為是林紓去世後的最早、最公允、最有分量的一篇對林紓翻譯活動作出精當評價的論文。^①鄭振鐸不僅有對林紓翻譯的局部研究，也有關於清末翻譯史整體的描述，如1936年他發表了《清末翻譯小說對新文學的影響》一文，該文將中國翻譯史劃為三個時期：1600—1894年“西洋文化接觸的時期”，1894—1917年“政治教育改革時期”，1918—1936年“倫理與文學的改革時期”。第一個時期主要吸取西方的機械工程學和其他應用科學，出現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第二個時期是認識到中國不僅缺乏應用科學，政治與教育也不行，於是注意吸收西方的政治、法律和社會科學；第三個時期是認識到提倡政治改革外，還注意到吸取倫理和文學的內容。他強調了清末翻譯與“五四”後翻譯的本質區別在於前者是“無意識的介紹”，後者是“有意識的介紹”；認為祇有清理了近代翻譯史是如何變化的，纔能通過前車之鑒克服過去的錯誤，隨着時代的發展而進步。該文還介紹了清末若干小說翻譯的雜誌以及重要的譯家，如周桂笙（1873—1936）、林紓、伍光建（1867—1943）、英檮（顯然是吳檮的誤寫）、周作人、包天笑等，稱“伍光建——他自己說他的翻譯是有目的的，他曾經譯了些《拿破崙傳》、《法國大革命史》……可是他時常大膽的刪節原作的一部分，這是不對的，他以‘君朔’的名字譯的大仲馬的《俠隱記》等，卻是很好的。在清末的翻譯界總算是一個重要的人，特別因為他是用白話文譯的”。他認為清末的小說原本主要來自英文、日文和法文，“在翻譯的氣魄上說，現代的翻譯的人也趕不上他們的”。清末翻譯的主要問題一是向中國讀者的口味和倫理觀妥協；二是利用外國小說翻譯來做改革政治的工具；三是讀者把翻譯小說作為茶餘飯後的消遣品，因此造成無聊的偵探小說和言情小說氾濫；四是無正確的文學常識，多是翻譯流行小說，名著翻譯得很少；五是翻譯的不忠實，“很多地方信意更改”，但社會影響卻很大。鄭振鐸的幾篇有關翻譯史的論文組織細密，兼顧整體和細節，評論鮮作驚人之語，論見多有考證支持。

此一時期另一位從事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研究的傑出學者是阿英（1900—1977），1937年5月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晚清小說史》，分為十四個專題，闢有“翻譯小說”的專章來討論晚清的翻譯小說，還對晚清翻譯小說進行分類研究。該書問世後不久即引起海外學界的關注，1939年德國學者阿爾夫雷德·霍夫曼將該書的第一、第二章譯成德文，發表在同年漢堡《亞洲週報》上。1938年，阿英還以章回體小說的形式，以幽默的標題語言來編纂近



鄭振鐸



賀麟

^①陳福康：《鄭振鐸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第179—180頁。



代中國的《翻譯史話》：第一回“普希金初臨中土高爾基遠涉重洋”，講述了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1799—1837）最初譯成中文的著作是其名著《甲必丹之女》，即1903年大宣書局推出的《俄國情史》，而高爾基（А. М. Пещков，1868—1936）的文字出現在漢語文獻中要到1904年《日俄戰紀》，最初譯成中文的是1907年刊載於《東方雜誌》上的《憂患餘生》。第二回“萊芒托夫一顯身手 托爾斯泰兩試新裝”，主要描寫1907年最初譯成中文的萊蒙托夫（М. Ю. Лермонтов，1814—1841）的《銀紐碑》和最初譯成中文的托爾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1828—1910）小說《不測之威》和《蛾眉之雄》，這是中國最早翻譯出的四位俄國和蘇聯作家的概況。第三回“虛無美人款款西去 黑衣教士施施東來”，反映了俄國民粹黨的文學形象，以及小說中暗殺活動的事蹟，其中也包含有契訶夫（А. П. Чехов，1860—1904）小說《黑衣僧》和《六號室》；第四回“吟邊燕語奇情傳海外 蟻隙花劫豔事說冰洲”，則解說早期莎士比亞（W. Shakespeare，1564—1616）戲劇通過通俗文學的形式在中國傳播的實況，可惜祇寫了四回，便沒有了下文。^①1941年6月，阿英署名“魏如晦”在《譯文叢刊》第3輯上發表《初期的翻譯雜誌》，討論了《譯書公會報》、《譯書彙編》、《譯林》、《勵學譯編》、《遊學譯編》等刊物，似乎也沒有寫完。^②上述這些，可能都是他計劃中的晚清翻譯史寫作的一部分。

（四）綜合性歷史與文獻學著述中的翻譯史

20世紀30—40年代，還有若干歷史學家也關注翻譯史的研究。例如，1930年問世的鄭鶴聲、鄭鶴春編纂的《中國文獻學概要》（上海：商務印書館）一書，是第一本以“文獻學”命名的文獻學著作。該書“例言”中認為，“結集翻譯編纂諸端，謂之文；審訂講習刻印諸端，謂之獻”，並首先注意到了翻譯在文獻學系統中的地位。該書分導言、結集、審訂、講習、翻譯、編纂、刻印七章。^③儘管該書篇幅不大，但考察的視域卻相當寬廣，已經注意到了現代意義上的內部方法與外部方法，試圖對文獻學進行整體思考。該書將東漢以來的佛教翻譯和晚明以來的科學翻譯作為“翻譯”章節的主要內容，指出中國對於他國知識之輸入，“一為隋唐以前之印度文化，二為明清之歐西文化。此二種文化，前者已告一段落，後者則日新無已”。鄭一奇在為該書所作的“導讀”中指出：“從世界文化的背景看中國文獻學，勢必涉及中外文獻之交流，特別在近世中西文化衝撞的背景下，在中國社會由封閉轉向被迫開放的歷史大勢下，‘翻譯’既與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密不可分，對現代文獻學的研究更是題中應有之義。因為現代文獻學較之傳統文獻學更重視研究文獻的產生、分佈、交流、利用等規律的探討。隨着科技的發展，傳播信息載體的變化，翻譯作為世界文化交流的橋樑，是現代文獻學的重要內容之一。”^④然而，這一嘗試似乎沒有得到學術界的重視，民國時期有關圖書、版本、校勘、目錄學的著述甚多，而綜合性的文獻學論著僅此一種，而同時代的文獻學著作均未將翻譯作為文獻學考察的對象。但作者的見識受到了譯界的高度重視，1940年，西風社推出的由黃嘉德（1908—1992）編輯的《翻譯論集》，分為“翻譯通論”、“論譯名”、“論譯詩”和“翻譯的歷史”四輯，其中第四輯“翻譯的歷史”收入的就是胡適《國語文學史》“佛教與文學翻譯”和鄭鶴聲等《中國文獻學概要》中的“科學翻譯史”

^{①②} 阿英：《小說四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29—246、220—228頁。

^③ 鄭鶴聲、鄭鶴春：《中國文獻學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頁。

^④ 鄭一奇：“導讀”，《中國文獻學概要》，第1—13頁。



一節。^①1944年，《說文月刊》第四卷還刊載有鄭鶴聲（1901—1989）撰寫的《八十年來官辦編譯事業之檢討》一文，指出清末以來的編譯事業，京師同文館為首創，“近世翻譯之風氣，因之而興。至江南製造局出，附設翻譯館，以編譯國防之書籍，於是編譯之風為之一變。其次，學部成立後，設立編譯圖書局，以編譯教科應用之書籍，於是編譯之風為之再變。惟製造局與圖書局時代之編譯工作，專以介紹西洋新知識為主，故偏重於翻譯之工作。民國以來，創設國立編譯館，除用翻譯方法以吸收西洋文化外，兼採整理方法，以發揚我國固有之文化，於是編譯之風氣又為之一變”。^②由此，作者把清季以來的官辦編譯事業分為四個時期：京師同文館時代；江南製造局時代；學部編譯圖書局時代；國立編譯館時代。

1937年，周昌壽（1888—1950）撰寫了長文《譯刊科學書籍考略》（有抽印本單行）。這是20世紀中國最早研究科學翻譯史的成果。該文統計了明末清初天文學、數學、地理學譯著132種，清末的譯書468種，涉及天文地理、數學理化、地理測繪等多個學科，將明末以來的科技翻譯分為明末迄清初、咸豐迄清末、民國成立至1936年三個歷史時期，認為第一期所譯以天算為主，旁及地理及應用科學，列出了利瑪竇（M. Ricci, 1552—1610）到瑪吉士（J. M. Marques, 1810—1867）等23位中外譯家；第二期與第一期相比，譯書事業有了集團從事的組織，如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格致書室、美華書館等，科學譯本雖程度不深，但涉獵廣博。^③

這一時期討論翻譯史還有一些通史類著述，如歷史學家柳詒徵（1879—1956）的《中國文化史》一書部分內容1925年曾在《學衡》雜誌上發表，1932年由南京鍾山書局出版。全書六十餘萬字，被胡適譽為中國文化史“開山之作”，是“近年中國出版界的一部大書”。^④該書將中國文化史的三大時期分為上古、中古、近世三編：第一編自遠古至兩漢，為中國文化創造獨立的文化時期；第二編自東漢至明季，為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由衝突而融合的時期；第三編自明季至民國，為西方文化漸次輸入的時期。該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注意用相當篇幅討論譯書，如該書第十四章“譯書與遊學”，從道光年間魏源（1794—1857）等人的地志翻譯到同文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譯書，以及嚴復和甲午戰爭後留學生與日文譯書都有所涉獵。

綜上可以看出，與中國悠久的翻譯傳統相比，雖然中國翻譯史研究起步較晚，但卻有着一個很高的起點，參與研究的不僅有風雲一時的大學者梁啟超、胡適，也有後來成為著名文學家的鄭振鐸和阿英，哲學家賀麟；多學科研究者的參與也是早期中國翻譯史研究的特點之一，參與翻譯史研究的不僅有文獻學家鄭鶴聲，還有歷史學家柳詒徵，譯史的內容在20世紀30年代就進入了綜合性歷史文獻學和通史類著述。“翻譯文學”的概念在中國翻譯史研究的發軔階段已經被提出並受到文學史家的注意，而且很快寫入中國近代文學史、新文學史，成為小說史編纂的一種角度。發軔階段的學者注意介紹和借鑒海外的翻譯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形成了中國翻譯史研究上多角度、多學科研究的特點。正是因為早期中國翻譯史研究起點較高，使得20世紀的中國翻譯史研究在初期階段就形成了一種比較寬闊的外部史研究的視野，為80年代以來中國翻譯史研究的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二、20世紀中期兩岸三地譯史研究的承接與轉折

20世紀50—70年代末，大陸、臺灣和香港（簡稱“兩岸三地”）由於制度與意識形態的

① 黃嘉德編：《翻譯論集》（上海：西風社，1940），第273—305頁。

② 黎難秋主編：《中國科學翻譯史料》（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6），第682—703頁。

③ 胡適、蔡元培、王雲五編輯：《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第409—430頁。

④ 胡適：“評柳詒徵著《中國文化史》”，《清華學報》2（1933）；轉引自桑兵等編：《近代中國學術批評》（北京：中華書局，2008），第169—172頁。

差別，造成了學術的分途發展，史學研究也被劃分為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大陸史學和所謂民主陣營的臺灣和香港史學。兩岸三地的翻譯界轉折過程都經歷了一系列頗為劇烈的衝突與變動，迄今少有充分的討論，這裏擬通過若干專題來考察兩岸三地翻譯史研究的實況。

（一）《翻譯通報》與“中國翻譯史特輯”

大陸對1950—1960年代中期，即“文革”前十七年的翻譯史研究，迄今很少有充分的認識。當時的譯界領袖人物董秋斯（1899—1969）在1950年11月召開的全國翻譯工作會議上強調，“編著《中國翻譯史》，用正確的歷史觀點，總結東漢以來一千幾百年的翻譯經驗，從發展的過程中，把握正確的方向和法則”^①。1951年3月15日出版的《翻譯通報》第2卷第3期發表了《遐壽同志來信》，這是編者為編輯中國翻譯史專門向周作人請教。周作人在回信中寫道：“關於編中國翻譯史，鄙意第一步搜集材料最為緊要。第一段落，六朝至唐之譯佛經，其集體譯述的方法恐大有可供學習之處。祇見過梁任公、楊仁山文中稍有談及，須着力去調查。第二段姑且說清末之譯《聖經》，以至《申報》館、廣學會等工作，別一枝則由製造局譯書以至在《時務報》時代，中間以嚴幾道、林琴南為過渡，到達新文學，則為第三段落矣。”1951年，董秋斯在《翻譯通報》第2卷第4期發表了《論翻譯理論的建設》，提出“由中央人民政府有關翻譯工作的領導組織專家，從事有關搜羅東西各國有關翻譯理論和制度”的書刊等六條建議，並把完成《中國翻譯史》和《中國翻譯學》兩部大書作為新中國翻譯工作從感性階段走向理性階段的標誌。^②翻譯界和學術界為之深受鼓舞，下一期的《翻譯通報》有“特大號”，刊載了巴金（1904—2005）、李壽野（1904—1997）、卞之琳（1910—2000）、穆木天、雷海宗（1902—1962）、袁昌英（1894—1973）關於翻譯的短論，馮友蘭（1895—1990）、周作人（署名遐壽）也就翻譯計劃提出了自己的建議。該號還推出“中國翻譯史特輯”，發表了一系列有關中國翻譯史的討論，其中有葉恭綽（1881—1968）的《由舊日譯述佛經的情況想到今天的翻譯工作》、張建木的《論吸收古代的翻譯經驗》、蘇晉仁（1915—2002）的《佛教譯場的發展》、余文的《古代的翻譯機構與翻譯方法》、印度柏樂天（Prahlad Pradhan）的《偉大的翻譯家玄奘》、黃賢俊（1911—1984）的《談玄奘與“佛教譯場”》、漆俠（1923—2001）的《宋代的佛經翻譯》、謝再善（1903—1977）的《略論元朝的蒙古文翻譯》、季羨林（1911—2009）的《對於編修中國翻譯史的一點意見》、張孟聞（1903—1993）的《關於中國翻譯史的幾個問題》。編者在“特輯前記”寫道：“自從本刊提出編修中國翻譯史的問題以來，好多位老師宿學提出很可貴的意見，最近更把多年研究心得寫成長篇論文交我們發表。感念之餘，我們深刻地覺悟，祇有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纔能有這樣熱心於學術文化的集體表現。”^③

這些文章，一部分是討論佛典翻譯經驗對於中國當代翻譯發展的意義，如葉恭綽的文章提出可以借鑒唐代譯場的經驗，出版總署也應該設立一個譯學館來專辦譯述工作，設立最高級譯員、高級譯員、普通譯員和練習譯員，以培養譯事的專門人才。張建木的文章提



^① 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第367頁。

^② 董秋斯：“論翻譯理論的建設”，《翻譯通報》4（第2卷，1951）：3—6。

^③ 董秋斯：“特輯前記”，《翻譯通報》5（第2卷，1951）：51。



出了對勘梵文與漢文經典，發掘古代翻譯經驗的重要性。其他一些著名學者、翻譯家、歷史學家、科學史家，也從不同角度談了他們對編纂中國翻譯史的意見，如季羨林的文章提出古代中國在翻譯方面的成就為任何國家望塵莫及，翻譯史之長亦獨一無二，應集合衆多專家通力合作進行翻譯史的編修。^①

編纂翻譯史，很重要的是分期問題，蘇晉仁在文章中把佛典翻譯分為草創時期（後漢桓帝到西晉，148—316）、發展時期（東晉到隋朝，317—617）、極盛時期（唐朝至北宋，618—1126）、衰微時期（南宋至清朝，1127—1911），然後分四個時期討論了每個時期的譯經和譯場。他還就周作人的分期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周作人僅將清末作為翻譯史的第二階段，其實應該上溯到明末利瑪竇、徐光啓（1562—1633）的譯書；認為中國翻譯史應該分為三個階段，即後漢到元朝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西洋學術翻譯，清末至新中國的西洋學術和日本學術的翻譯，並可以五四運動為分界，分成前後兩個階段。敘述範圍除了佛經翻譯的古譯、舊譯、新譯三個階段外，還應有西洋學術、甲午戰爭以後的日本學術以及兄弟民族語文方面的翻譯，如藏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蒙文、滿文等。^②張孟聞的文章提出史料收集要完整，時代劃分要有自己的見解，主張中國翻譯史可以分為：（甲）秦漢以前的前古翻譯史跡；（乙）六朝與隋唐，為佛經翻譯的主要時代；（丙）宋元為東西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時代，翻譯大抵是外交文書與教廷檔；（丁）明清，明末開始進入了“一個有系統、有計劃的黃金時代。利瑪竇的東來。下迄清初，一直延長到‘新學’時代，這是百科競新的翻譯時代，不但哲學著作，也連到一切科學部門，都有很好的譯作出世。這批翻譯者，從徐光啓等起，到製造局時代止，頗有不少大手筆、大名家，而且大都是中外學人合作的”；（戊）五四運動前後，翻譯者從中外合作走到中國人獨立自譯的時代；（己）現在，這是一個開創的時代，並以《翻譯月刊》和《翻譯通報》為例，認為翻譯史的敘述範圍首先是外交檔，其次是宗教經典，再者是自然科學翻譯、文學翻譯和社會科學翻譯。^③

1951年《翻譯通報》第3卷第1期再度推出“中國翻譯史特輯”，刊載了署名“參話”的《佛典的傳譯人數和譯本部數：從後漢到元初》。作為《中國佛典翻譯史》的一節，該文在編纂方式上深受梁啟超《中國佛教研究史》一書的影響。如果說有所創新的話，是該文將佛典翻譯分為五期：（1）後漢明帝十年（67）至唐玄宗開元十八年（730）的六百六十四年；（2）開元十八年（730）至唐德宗貞元五年（789）的六十年；貞元五年至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的一百九十四年；（3）太平興國七年至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的三十年；（4）大中祥符四年至仁宗景祐四年（1037）的二十七年；（5）景祐四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的二百四十九年。但是，該文所依據的主要材料之一為“集唐宋經錄大成的《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其中唐宋經錄記載已亡的書名、譯人事蹟等長處卻被丟失了，所以其在研究譯史上的優點反而不如之前的佛典目錄。而且，該文將佛典翻譯分為五期，長的太長，短的太短，其中譯經的人數、部數都未經考訂。^④

1951年的這場關於中國翻譯史編纂的討論轟轟烈烈，學者們的熱情非同尋常；但自1952年春天開始，風雲突變，3月號刊出了署名“翁濂”的《展開翻譯界的三反運動》，牽強附會地強調翻譯界也有必要“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然後刊載了由中央

① 董秋斯：“特輯前記”，《翻譯通報》5（第2卷，1951）：第56—60。

② “蘇晉仁同志來信”，《翻譯通報》5（第2卷，1951）：80。

③ 張孟聞：“關於中國翻譯史的幾個問題”，《翻譯通報》5（第2卷，1951）：70—71。

④ 參話：“佛典的傳譯人數和譯本部數：從後漢到元初”，《翻譯通報》2（第3卷，1951）：43。



戲劇學院教研室翻譯組夏立民等人提供的檢舉信，揭發該學院的湯素民從編譯局預支了稿費，雇用別人參與翻譯；一位署名“宏”的在《和個人主義的“翻譯家”鬥爭》一文中“要求每一個翻譯工作者都具有為人民負責的政治品質”，並提出“對於那些個人主義的‘翻譯家’要展開毫無留情的鬥爭，給予最嚴格的批評。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上不容許那些毫無政治基礎的人們來破壞”！這些文章給那些熱心的學者幾乎是當頭一棒。1952年4月號至6月號推出了“三反運動中翻譯界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特輯”，4月號分為“自我批評之部”和“批評之部”兩個專欄，刊載了賓符（1915—1966）、高名凱（1911—1965）、穆木天、高植（1911—1960）、董秋斯等人的自我檢討文章，以及對高名凱、韋叢蕪（1905—1978）等譯作的批評文章。^①由於這些文章充滿了火藥味，使得幾個月前還紛紛在《翻譯通報》上亮相的“好多位老帥宿學”都銷聲匿跡了。

（二）蘇俄翻譯史研究的轉向

隨着1950年抗美援朝運動的發生，中國的對外關係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在各個領域得到強化。出現在翻譯界的特點是，俄文翻譯日趨活躍。沈志遠（1902—1965）在《為翻譯工作的計劃化和提高質量而奮鬥》一文中引用了出版總署編譯局出版處的統計：從量的方面來講，1919—1949年的三十年中，全國翻譯出版的書籍約計6680種，其中譯自英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著述佔全部翻譯書的67%，譯自蘇聯的佔9.5%；而1950年一年的翻譯書多達2147種，其中從蘇聯翻譯的書籍居第一位，計1652種，佔77.5%。過去三十年中居首位的從英文翻譯的書籍退居第二位，僅382種，佔18%。作者斷言：“過去三十年間所出版的三千餘種社會科學書籍（佔全部翻譯書籍的百分之四十九），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反動書籍，而一九五〇年所出的近七百種社會科學書籍，卻絕大部分都是馬列主義觀點的著作了。”“從這一事實，也可以看出蘇聯先進文化受到中國人民熱烈的歡迎。這是由於革命得到了勝利，人民迫切要求向蘇聯學習，要求用社會主義的學術文化來幫助自己國家的建設，以鞏固既得的勝利。”^②翻譯出版的傾向同樣反映在翻譯史研究中，一些原來從事俄文翻譯和俄蘇文學介紹的學者從邊緣走向了核心，如曾經在國統區從事《蘇聯文藝》編輯的戈寶權（1913—2000），轉道解放區到達北京，1949年初參加了郭沫若率領的代表團前往布拉格，先後在莫斯科工作五年，1957年起任中國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他早年就翻譯和研究俄蘇文學，此時則如魚得水，先後完成了《高爾基在中國》（《文學研究》1958年第1期）、《契訶夫在中國》（《文學評論》1960年第1期）、《談普希金的〈俄國情史〉》（《世界文學》1962年第1、2期）、《高爾基作品的早期中譯及其他》（《世界文學》1963年第4期）。^③許多原來從事其他國別文學研究的學者，或自覺或被迫地也將研究方向轉向了俄蘇文學翻譯史，如原來從事德語文學研究的馮至（1905—1993）、陳祚敏、羅業森的《五四時期俄羅斯文學和其他歐洲國家文學的翻譯和介紹》（《北京大學學報》1959年第2期）等。

受此影響，一般中國通史除了介紹佛經翻譯外，很少討論晚明以來的西學東漸與晚清的西書中譯。在自覺與民國時期翻譯史研究傳統形成斷裂的同時，年輕的學者也試着去構建一種新的傳統。在“大躍進”時代前後，復旦大學中文系1956級學生組成的《中國近代文學史》編寫小組和北京大學西語系法文專業1957級的學生分別編寫過《中國近代文學史稿》和《中國翻譯文學簡史》。前者於1960年5月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過單行本，被

① 《翻譯通報》4（1952）：3—30。

② 沈志遠：“為翻譯工作的計劃化和提高質量而奮鬥”，《翻譯通報》4（第3卷，1951）：7—16。

③ 戈寶權：《中外文學因緣》（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認為是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近代文學斷代史專著”^①；該書有專篇討論林紓的翻譯，雖然也有林紓“站在歷史的背面，妄想拉住將被淘汰的東西，是注定要失敗的”之類的批判性語言，但總體上還算能夠尊重歷史事實，對前人研究亦有少量提及，如阿英的研究。後者於1960年作為教材也印行過，使用了民國時期用過的“翻譯文學”的概念，第一編“五四運動年的翻譯文學”，第二編“1919—1927年的翻譯文學”，第三編“1927—1937年的翻譯文學”，第四編“1937年—1949年9月的翻譯文學”，第五編“1949年10月—1958年7月的翻譯文學”。受極左思潮的影響，該書將所謂兩條路線的鬥爭作為貫穿翻譯史的主線，並集中批判了翻譯家傅雷（1908—1966）、傅東華（1893—1971）。該書對翻譯偵探小說的流行幾乎完全回避，掩蓋和遮蔽了當時清晰的文學史面貌。由於該書有羅大岡（1909—1998）、戈寶權、董秋斯、曹靖華（1897—1987）等學者的參與，因此，儘管其中觀點極左味道很濃，但也算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部完整的標明為《中國翻譯文學史稿》的著作^②，可以視為分析此一時期大陸翻譯史研究的標本。這兩本文學史清楚地反映着大陸史學界的幾個重要動向：一是由個人研究轉向衆手修史的集體研究，二是由名山事業轉向大規模的群衆事業，三是由唯心史觀轉向明顯受到政治意識形態影響的所謂唯物史觀分析，四是由歐美為中心轉向注重蘇俄和亞洲被壓迫民族的歷史。^③

（三）翻譯出版史資料整理的兩大家：阿英與張靜廬

20世紀50—60年代，默默延續着民國時期翻譯史研究的傳統，在新的政治環境下繼續做着中國翻譯史資料整理和研究工作的還有阿英和張靜廬（1898—1969）。阿英從30年代起就致力於近代各類書籍的搜集整理工作，數十年堅持不懈；為搜集一些稀見的書籍、報刊和資料，他經常到各地書店、地攤去“訪書”、“淘書”，這些可以從其《城隍廟的書市》、《西門買書記》、《海上買書記》、《浙東訪小說記》、《蘇常買書記》等文中窺見一斑，其用力之勤、收集之廣幾無人能望其項背。這種搜集翻譯小說資料的艱辛以及為之所付出的勞動，處在網絡時代的讀者已經很難體會了。1949年後，他繼續從事翻譯史資料的整理，所編《晚清戲曲小說目·翻譯之部》著錄晚清翻譯小說608種，1955年由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初版，1957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修訂本時增加到629種，為學界提供了珍貴的索引。他的這一統計，在四十年後纔為日本學者樽本照雄的統計所超越。他那部開創了晚清小說研究領域的《晚清小說史》1955年經過修訂，至今仍不斷在重印；1979年還有東京平凡社的飯塚朗、中野美代子的日譯本。^④1958年，阿英還以報刊為中心出版了《晚清文藝報刊述略》（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將他利用晚清報刊文獻的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他長期整理的《晚清文學叢鈔》12卷，洋洋500萬字，有關翻譯小說的資料集中在《小說戲曲研究卷》、《域外文學譯文卷》（第1—4卷）和《俄羅斯文學譯文卷（上、下）》（北京：中華書局，1961）中，也在此一時期紛紛面世。即使是資料收集，也很難擺脫意識形態的影響，其間他也配合着蘇俄翻譯史研究的轉向，先後撰寫了《俄羅斯和蘇聯文學在中國》（《文藝報》1956年第21期）、《關於列夫·托爾斯泰》（《世界文學》1961年第12期）、《赫爾岑在中國——翻譯文學史話》（《世界文學》1962年第4期）。在編選《晚清文學叢鈔 域外文學譯文卷》時，阿英稱偵探小說是伴

① 韓偉表：《中國近代小說研究史論》（濟南：齊魯書社，2006），第135頁。

② 謝天振：《譯介學》（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第212—222頁。

③ 關於大陸史學界重要的動向，可參見劉大年：“中國歷史學科學現狀”，《光明日報》1953-07-22。同一時期以集體方式撰寫的文學史還有北京大學中文系專門化1955級學生集體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組學生集體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三、四年級同學編寫的《中國文學講稿》（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等。

④ 吳泰昌：“阿英著作目錄”，《阿英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第948—970頁。



着資本主義抬頭的產物，無積極影響甚至有害，故對晚清流行最廣的翻譯偵探小說一篇也未加選收。

張靜廬是一位有着濃厚學術興趣的出版家，早年在文化出版界任記者和編輯。1920年任上海泰東圖書局編輯、出版部主任；1925年與沈松泉等合資創辦光華書局；1929年獨資經營上海聯合書店，任經理。1931年與洪雪帆合作，重返現代書局，任經理。他還從事過文學創作，1922年上海洋左書局刊行過他的《新體短篇小說集》，1920年所著《中國小說史大綱》由泰東圖書局出版，1920—1930年代他還撰有《中國的新聞記者》、《中國的新聞紙》、《新聞學概要》、《中國通信社》等；自傳《在出版界二十年》流傳甚廣。正是這一創作的興趣，促發了他在1949年以後廣泛搜集出版史料，編纂了《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二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乙編、丙編、丁編，《中國出版史料補編》等，迄今仍是搜羅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最宏富的著述。吳永貴在《民國出版史》“張靜廬：四馬路出版界的霸才”一節中指出：“張靜廬能完成如此大規模的史料輯註工作，而且做得如此出色，除了自身勤於收羅、友朋鼎力相助等方面的因素外，他本人在此之前長達三十年的出版職業生涯，也為之鋪墊了經歷上和專業上的基礎。”^①



張靜廬以一人之力，實踐“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精神，歷時二十年的苦心收集，精心整理和輯註了《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七編八冊，其中近代部分為二編二冊（初編，上雜出版社，1953），二編（群聯出版社，1954），收入1862—1918年的資料；現代部分（1919—1949）為四編五冊（甲、乙、丙、丁編，中華書局，1954—1959），外加補編一冊（中華書局，1957），全書七編約二百五十萬字，收入近四百幅圖片和書影，保存了大量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彙集了近百年來有關新出版事業的重要資料而成。^②取材範圍與內容：（1）圖書序跋，如《東西學書錄敘例》、《東籍月旦敘論》等；（2）報刊資料，如《中國各報館始末》、《清末小說雜誌述略》等；（3）編譯文獻，如《奏請創設京師同文館疏》、《上海設立同文館議》、《大同譯書局敘例》、《奏請設立譯書院片》、《譯書交通公會序》、《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一九二九年中國關於社會科學的翻譯界》等；（4）教科書編刊，如《清末以來我國小學教科書概觀》、《教科書之發刊概況》等；（5）印訂技術，如《清代印刷史小紀》、《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印刷術》等；（6）法令章程，如《大清印刷物專律》、《國民黨政府之出版法》、《譯印西文地圖公會章程》、《譯書公會章程》等；（7）發刊啓事，如《月月小說發刊詞》、《小說林發刊詞》等；（8）書目年表，如《漢譯東西洋文學作品編目》、《中譯俄小說編目》、《高爾基作品中譯本編目》、《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譯本年表》等，附有珍罕書影、插圖及出版大事年表，並對其中許多重要的事項作了簡要的註釋，令人歎為觀止。該資料集不僅包括了1862年京師同文館創立至1949年間翻譯出版的豐富史料，其中有關1919—1949年三十年間出版事業、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各解放區和上海淪陷後在中共領導下出版的紅色報刊、進步報刊的發展情況以及與統治者鬥爭的史實，尤其詳細。其中有些資料從未公開發表，是研究現代文化史和新聞、出版、圖書館發展史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獻。

張靜廬曾計劃編一部《近代翻譯書目綜錄》，學科包括自然科學、應用技術、政治、經

① 吳永貴：《民國出版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第267—274頁。

② 該書全套八冊本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彙編一起，2003年12月重版。



濟、教育、文化、軍事、史地、文學、藝術；有關宗教宣傳的書作爲附錄，時限從清代道光朝至宣統三年（1911）止，辛亥革命以後的不著錄。據他自己不完全統計，這一時期翻譯書大約有三四千種，絕大部分已經找不到了。過去雖然陸續有學者做過提要，由於沒有見過原書，一般都是照樣抄錄，沒有辦法補寫或改寫成新的提要。他的基本想法與其編纂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七編八冊類似，希望通過編纂這樣一部完備的翻譯書目，可以給研究近代各種專題翻譯史的研究者提供許多研究上的方便。^①可惜該計劃最終未能實現，不免令人惋惜！

（四）臺灣地區早期翻譯史研究者方豪、張振玉、孟瑤

1945年臺灣光復後，大陸的學者逐漸赴臺擔任學術職位。1949年，國民黨政權敗退臺灣，開始形成與大陸完全隔離的時代。發生在20世紀50—80年代的臺灣翻譯活動以及翻譯史研究實況，迄今似乎仍模糊不清。200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馬祖毅主編的五卷本《中國翻譯通史》，幾乎沒有臺灣地區的翻譯史內容；所引用的書目，也基本沒有列出臺灣地區學者所撰寫的有關臺灣翻譯史方面的論著。

臺灣地區在20世紀50—80年代末對翻譯史的研究，可以說是民國時期翻譯史研究的延續和發揚。在大陸翻譯史研究轉入沉寂階段的同時，一批優秀的學者則把民國時期有關翻譯史研究的傳統帶到了臺灣。他們承接着傳統重實證的研究方法，在臺灣形成了所謂“史料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方豪（1910—1980）。^②他的《中西交通史》（五冊）是研究明清之際西書中譯的代表，初版於1953—1954年，由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印行。方豪關於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最早可以上溯到1937年杭州我存雜誌社出版的《李我存研究》，分十三章，附有李之藻年譜；由於抗戰爆發，該書流傳不廣；1966年，經增訂由臺北商務印書館出版。1942年，遷居貴州遵義的浙江大學文學院出版有方豪的《拉丁文傳入中國考》。1944年是方豪創獲最多的一年，重慶勝利出版社出版了其所著的《徐光啓》，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了其《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第一輯，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其《中國天主教史論叢》甲集。1949年到臺灣後，方豪繼續着明清之際基督教宗教耶穌會士的西書中譯文獻的出版與整理工作^③，並陸續發表了多種有關中國翻譯史研究的成果，上至佛經翻譯，如《宋代佛教徒西行求經與譯經之成就》（《包遵彭先生紀念文集》，1971），下有《利瑪竇交友論新研究》（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1954年第6期）、《明萬曆間馬尼拉刊印之漢文書籍》（《第二十七屆國際東方學會議論文集》，1967），以及對《兩儀玄覽圖》的考證（《中央日報·副刊》1977年11月18日）、《耶穌基督漢文異譯考初稿》（李東華編著：《方豪晚年論文輯》，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0，第467—508頁，完成於1975年）等，這些論著至今仍是中國翻譯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力作。當然，最有代表性還是他的《中西交通史》和1967年出版的《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兩書。

《中西交通史》記述史前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凡四篇、六十九章、三百七十四節。“導言”把該書論述的範圍規定爲民族之遷徙與移植，血統、語言、習俗之混合，宗



① 俞篠堯：“出版家與出版史家張靜廬”，《書林隨緣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145—158頁。

②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上編，第27—42頁。在討論“史料派”的興起和影響時，他特別提到方豪，將其列爲臺灣史學發展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

③ 關於臺灣20世紀60—70年代明末清初漢文西書史料的整理工作，參見鄒振環：“漢文西書新史料的發現及整理與重寫學術史”，《河北學刊》1（2014）：12—18。



教之傳佈，神話、寓言之流傳，文字之借用，科學之交流，藝術之影響，著述之翻譯，商貨之貿易，生物之移植，海陸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維繫（使節之往返、條約之締結等），和平之破壞（糾紛、爭執與大小規模之戰爭等）。第一篇史前至秦漢魏晉南北朝，第二篇隋唐五代及宋，第三篇蒙元及明，第四篇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該書約七十萬字，既是一部通史，同時在結構和內容上又有所側重，尤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的交流。前三篇所敘起自先秦，終於利瑪竇來華，僅四十萬字；而第四篇僅敘述利氏來華至嘉慶五年兩百年的歷史，達三十萬字。第四篇中有不少篇幅涉及屬於西書中譯的討論，首次系統清理了明清之際西書中譯和中書西譯的若干史料，分別從天文學與曆學、數學、機械工程學與物理學、軍器與兵制、生物學與醫學、地理學、語文學諸方面，探討了明末至清代中葉的西書中譯，涉及內容廣博。^①該書特別注意這一時期輸入的西文原本問題，如關於明末七千部西書流入中國，以往學者很少言及，他則以相當的篇幅對金尼閣（N. Trigault, 1577—1629）攜七千部書籍入華的史實原委進行了詳細考訂，把當時北堂圖書館所存可能屬於七千部的殘存，按書目和文字一一舉出，首次揭開七千部入華書籍的全貌。方豪所著《李之藻研究》（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一書特別指出了李之藻（1565—1630）對譯刊西書的貢獻，以大量篇幅對李氏編刻《天學初函》的旨趣、國內藏本及中研院藏本等加以考訂。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等成果不僅材料詳贍，而且涉及廣泛，超邁前輩和同輩，代表了迄今為止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個標杆，特別在有關明清之際基督教耶穌會士的西書中譯研究方面，至今仍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成果。

此一時期臺灣學術界關於中國翻譯史研究若干有限的討論，還出現在其他一些專門著述之中。如張振玉（1916—1998）的《譯學概論》，最初是作者1963年在臺灣大學外文系受系主任英千里（1900—1969）囑託，為學生講授翻譯課程，1964年完稿，1966年由中台印刷廠出版。該書基本上採用文言體撰寫，問世後銷路甚好；1971年又由人人書局出版，在臺灣、香港風行一時；1989年經過修改，譯林出版社於1992年再版，書名改為《翻譯學概論》。全書分二十三章，第二章“中國翻譯史略”分為五節，第一節“佛經之翻譯”將佛經翻譯分為三期：（1）佛教之傳入中國的西漢時期至東漢明帝八年（公元65年），“其間名僧有安清、支謙、支讖、竺法護諸人。支謙、竺法護本天竺僧，久居中土，譯品獨優於衆”。（2）始自東晉，迄南北朝，為翻譯佛經之全盛時期。南方譯僧代表為佛陀跋陀羅（Buddhabhadra, 359—429），北方有鳩摩羅什（Kumārajīva, 344—413），“當時翻譯事業規模之龐大，譯述之謹嚴，濟濟人才，穆穆學風，千古之下，令人仰止”。（3）唐代。“此時期翻譯名僧為卓絕千古之玄奘法師。玄奘法師征天竺，研求佛法，歷17年，回國後19年內譯出佛經73部，共1330卷。”而宋朝以後譯經漸衰，因為大部頭佛經名作皆已譯出，譯經雖然廢續，但盛況已不可同日而語。第二節“明清間天主教士之翻譯”主要以《幾何原本》、《寰有詮》、《名理探》為例，討論明清間天主教義翻譯和科學翻譯，指出“當時於翻譯文體，多求雅正，以近中文為貴，蓋求我國公卿大夫學者之樂於閱讀也。然亦有以保持原文本意為要，而不於譯文上刻意求工者”^②。第三節“清末民初之翻譯”分別討論了嚴復、林紓、辜鴻銘（1857—1928）和英國人理雅各（J. Legge, 1815—1897）、翟理斯（H. A. Giles, 1845—1935）的翻譯。第四節“民初以來之英文漢譯”主要以曹未風（1911—1963）、梁實秋（1903—1987）、朱生豪（1912—1944）、虞爾昌（1904—1984）的《莎士比亞全集》翻譯為例，另外還討論了吳

① 1977年，臺灣出版了《中西交通史》第6版；1987年，嶽麓書社據新版出版影印本；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推出該書新版。

② 張振玉：《翻譯學概論》（南京：譯林出版社，1992），第7—8頁。



經熊（1899—1986）以古體詩翻譯的《聖經舊約》以及張谷若（1903—1994）所譯的英國哈代（T. Hardy, 1840—1928）的小說《還鄉》、《苔絲》，認為其譯作“譯文不愧信達美，且附豐富之研究註釋，真譯品中之瑰寶也”。^①第五節“英譯我國文學名著舉要”分為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四大部分。第三章“中國之翻譯論”，實際上類似中國翻譯理論史的節本，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分為佛經之翻譯論，共五節，分別討論直譯、鳩摩羅什之意譯、慧遠（334—416）之折衷說、彥琮（557—610）之《譯者八備》說、玄奘（602—664）之五不譯說（附明清間天主教士之重質說）；（中）部分討論嚴復之翻譯論，分為兩節，一是信達雅說，二是“信達雅”說引述；（下）部分“民初以來之翻譯論”分為四節，一是直譯與意譯論，二是陳西滢（1896—1970）之“神韻說”，三是曾虛白（1895—1944）之翻譯論，四是林語堂（1895—1976）之翻譯論。該書梳理了中國翻譯史和翻譯理論演變的大勢，脈絡基本清晰；但因為是一本翻譯理論著作，重點不在翻譯史或翻譯理論史，所以譯史譯論部分掌握的材料有欠充分，不少材料都未註明出處，一些章節內容顯得過於單薄。

關於文學翻譯的研究，20世紀60—70年代應該列舉兼有作家和學者雙重身份的孟瑤（1919—2000）。其《中國小說史》（臺北：文星書店，1966）一書貫通先秦到晚清，按朝代時期分為先秦、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六大部分，敘述了中國小說歷史變遷的大勢，論述了中國小說發展的內容和形式等諸問題；對於作家作品，既有宏觀的評介，又有微觀的剖析。該書在清代部分論及“翻譯”，指出中國的文學翻譯開始於清代乾隆年間，最初“多半是擷取《聖經》故事或某些名著的內容，加以重新撰寫”；甲午戰爭以後，民心覺醒，在發現了中國可怕的貧弱以後，不免渴望學習西方的民主政治，也希望引進西方的哲學文學，“於是翻譯之風由此而盛”，值得特別表彰的就是嚴復和林紓。該書用相當篇幅討論了林紓的翻譯，指出這一翻譯之風的盛行也帶動了20世紀初日本譯作的流行。那時來自域外的文學作品，譯筆是否忠實並不重要，雖曰翻譯，其實還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至於小說題材的選擇，主要取決於市場的趣味。如周樹人和周作人兄弟合譯的《域外小說集》，譯著的態度十分謹嚴，卻賣不出去，“但他們卻為五四運動以後的直譯打開了良好的風氣”。^②由於孟瑤以帶有感情的筆調來探討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的各種問題，娓娓道來，頗有引人入勝之處，因此該書在臺灣地區有着廣泛的影響，被很多學校作為文學史的教材，1980—1990年代由傳記文學出版社不斷再版重印。不過，作家筆下的小說史，在資料上所下功夫畢竟有限，曾經被學術界指責描述之詞與鄭振鐸論著頗多雷同。其實，就版本知識、史學修養而論，孟瑤的成績自然不能與鄭振鐸同日而語，其基本觀點亦有大陸阿英等人的影子，好在作者對此有自知之明，在“序言”中已經說明：“全書的寫成，作者祇做了一點搜集、補充的工作，將一盤散落的明珠，以自己史學的綫另串成一組花絮；用別人的金綫，以自己的心裁另織成一襲新衣；假若它還能發出一些光彩，這光彩是由明珠的閃耀與金綫的奪目來完成的。作者祇分享了在貫串與組織過程中的快樂。”^③孟瑤此書的特點在於其文學鑒賞力，這一點為世人所誤解極多。

（五）釋道安與張曼濤的佛經翻譯史研究

此一時期臺灣地區翻譯史值得專門討論的還有釋道安（1907—1977）的《中國大藏經翻譯刻印史》（中華大典編印會，1978）。該書原本是應曾任台灣地區“教育部長”的張其昀（1900—1985）為紀念釋迦牟尼（Sakya-muni, 前565—前486）誕辰兩千五百年特別邀請撰写的一篇專

① 張振玉：《翻譯學概論》，第8—10頁。

②③ 孟瑤：《中國小說史》（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第675—679、1—3頁。

文，刊載於《佛教論文集》，後“修訂中華大藏經會”將該文抽出，另印單行本流通，先後出了三版，頗獲中外研究藏經史人士的好評。於是，道安擴充史料繼續充實，形成著作的規模。^①

該書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大藏經翻譯刻印總述”有四章，第一章“大藏經概說”，主要討論大藏經之意義、結集和傳播，以及近代之發現；第二章“中國大藏經之翻譯刻印”，分為“翻譯之概述”和“歷代藏經刊印之版本”兩節，前者討論譯館之人事組織及譯者之資格、翻譯進展時期和編輯目錄時期；第三章“國外刊印之中國藏經版本”，主要討論高麗刊印中國藏經述要、日本歷代刊印中國藏經述要；第四章“藏經之組織”。藏經版本雖多，但歷代藏經大體不出一個原則、三種格式。一個原則是：“經、律、論”三藏之次第編排法，貫穿於中國、日本、蒙古和高麗等版的編纂之中。三種格式是：

(1) 依據《開元釋教錄》格式。先大體分為“經律論”藏等部，再一一區別大小乘；於大乘經中又分“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五類。(2) 依據《閱藏知津》格式。分大藏經為“華嚴、方等、般若、法華、涅槃”之五部，並《開元錄》中的“寶積、大集”與密經等。(3) 依據大正新修大藏經格式。第二部分“歷代翻譯大德名錄及其所譯佛典”有十四章，按照時代順序，分別討論東漢、三國、西晉、東晉、劉宋、元魏北齊北周、南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譯師及譯經，以及民國時代的佛學翻譯。這一部分在全書430頁中所佔分量最大，多達351頁。作者指出，佛典翻譯第一因為有嚴密的譯場組織和人事安排，適才適用；第二，譯經大師全為濟世度人，而無分毫自私自利之心；第三，譯經大師犧牲畢生心血，專注翻譯工作，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第四，譯經大師學貫儒佛，文學根底深厚，譯意通暢，文義雅潔。第五，自東漢至北宋滅亡為止之千餘年間，各朝皇帝多將佛典之譯印視為國家事業，用政府力量予以全力支援。所以，譯出的經典迄今已兩千年，雖歲月推移，人事演進，但對佛典之一字一句，未有敢予更動者。此佛典之所以神聖，與近代以來譯著有根本不同。第三部分“中國大藏經歷代譯經師年籍表”，收入了264位譯經大師的編號、中文名字、法號、梵名、國籍、年代等，是第二部分內容的提煉。

《中國大藏經翻譯刻印史》堪稱中國第一部佛典翻譯出版史，作者還將佛典翻譯與明末以來的西學翻譯作了比較，在“自跋”中指出：“我國自明末開始，與西方文化相接觸，而自清末至民國以來，更為我國人前往西方留學之鼎盛時代，留學人數何止百萬計，然觀彼等學成歸國所謂之譯著，若與佛教學者之譯經註疏相較，誠如螢火之比日光，相差遠矣。蓋譯經師譯出之佛典，不僅義趣圓融，而且信、達、雅俱備。即使僅以文學價值言，中國固有之經籍，亦少有出其右者，而近代譯著，更難望其項背矣。且每部佛典之譯出，動輒達數百卷之多；如般若經、寶積經世。近代譯介之西方學說，不過是一鱗半爪之小部頭書籍而已，在架構上言，與佛典比擬，不啻有天壤之別。”^②從學術著作的角度來衡量，該書可議之處不少，如全書除少數幾種參考文獻外，沒有註腳。作者表彰歷代佛典翻譯的學術貢獻無可非議，但多從教界的角度出發，有過分誇大佛典的意義，如在“自跋”中認為東晉道安所編的《綜理衆經目錄》為“中國最早之圖書目錄”^③，顯然是不清楚之前還有劉向（前77—前6）、劉歆（前50—23）的《七略》以及據此編纂的《漢書·藝文志》，形成了史實上的錯誤。

張曼濤（1933—1981）係20世紀70年代臺灣佛學界佛教文獻出版的重要組織者和策



^{①②③} 釋道安：《中國大藏經翻譯刻印史》，第1、428、427頁。



劃者。1973年，他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並在東京創辦《天聲雜誌》。在日本期間，他開始計劃《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的編輯，在臺北創辦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在該社推出《玄奘大師研究》等著述，1978年出版逾三千萬言的《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全集多達一百冊，其中有《中國佛教通史論述》，《佛教與中國思想及社會》，《中國佛教史論集》的漢魏兩晉南北朝篇、隋唐五代篇、宋遼金元篇、明清篇，以及《中國佛教史學史論集》、《中國佛教寺塔史志》等，其中有不少內容或重印民國時期學者的論著。該社1978年出版的涉及佛典翻譯史著作有兩部，分別是張曼濤主編的《佛典翻譯史論》和《佛典譯述與著錄考略》。前者將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一些重要的佛學家、思想史家、文學史家關於佛典翻譯的重要成果都收入其中，既有臺灣、香港的，也有大陸的。可貴的是，編者力圖將政治與學術分開，在“編輯旨趣”中特別強調，收入的任繼愈（1916—2009）的《佛經的翻譯》一文屬於“作者後期的東西，心態已變，格調不一”，但“就文論文”，仍然予以選入，並指出該文的觀點結論都有“可取之處”。^①後者收錄的也是關於佛經目錄學的若干舊作，編者在《編輯旨趣》中寫道：不論研究任何一門學問，目錄學總是入門的最基礎的知識，從事佛教翻譯的研究同樣如此；佛教的“影響力量和歷史、文化的背景如何，從典籍的譯述及目錄的記載中，亦即可知其全面的狀況。今天探討佛教者，不僅要顧及到它已為衆所周知的文獻典籍，更需要搜索尚未為人所熟悉的資料、目錄，始可作進一步之瞭解或發現”。鑑於佛典文獻浩如煙海，如果不是目錄學專家，對於這些文獻的典藏“實難瞭然，且經海浩瀚，史籍湮漫，即專業性之目錄、文獻學者，亦未必一一皆能盡知”。該書收錄的七篇中，劉國鈞的三篇《後漢譯經錄》、《三國佛典錄》、《西晉佛典錄》為“一氣呵成之作，對於歷代有關記載者作了一番爬梳工夫，對我國初期佛典之譯述問題，越發有了清晰面目。其餘四篇，則可能尚非一般教界人士所知，對已熟悉者而言，正亦可備為手邊檢閱，隨時置用。特別是《藏譯印度佛學論著錄目》及《敦煌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正好是研究中國佛學者所必須留意之特別資料”；並強調把收錄論文的眼界僅僅局限在“已知者，則窗戶自封，視野全閉，其在研究上之損失，自是難以道里計也”。^②

（六）臺灣學術界的近代西學翻譯史

20世紀60—80年代，臺灣學術界出現了不少優秀的有關近代西學翻譯史的專題研究，其中大多由歷史學者完成。例如，60年代有郭廷以的《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大陸雜誌》1967年第3卷第4期）、《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輸入——晚清譯書與西學》（《大陸雜誌》1967年第4卷第1—2期），如果說前者還主要是從思想史角度的切入，後者幾乎算是一篇晚明以來簡明的西學翻譯史了。它從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開始，分七節討論了中國人如何通過譯書漸漸從西方軍事工業，一直到民主思想之認識深化的過程。1969年，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王樹槐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輯上發表了《清末翻譯名詞的統一問題》，集中研究了晚清傳教士翻譯中的譯名問題，之後他還撰寫了《基督教教育會及其出版事業》（《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和《清季的廣學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1973）等，為研究晚清基督教傳教士的西書中譯，不僅梳理了材料，也提供了研究方法。

這一時期也有關於傳教士個別人物的研究，如閻振瀛《理雅各氏英譯〈論語〉之研究》（臺北：商務印書館，1971）；先後任職於臺灣中原大學、東吳大學的林治平出版有《基督教與中國近代化論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0），其中有《丁韙良的生平與志業》，

① 張曼濤主編：《佛典翻譯史論》（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第1—2頁。

② 張曼濤主編：《佛典譯述與著錄考略》（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第1—2頁。



指出丁鍵良（W. A. P. Martin, 1827—1916）不僅在早期寧波傳教期間致力於基督教教籍的翻譯，主持京師同文館期間還成立了專門的翻譯處，其中包括洋教習和高班學生，在譯介西方法律、數學和語言學方面貢獻卓著，所譯的《萬國公法》流傳較廣，對中、日、韓三國的國際法知識的獲得及譯名的確立均發生了很大的影響。^①1985年，宇宙光出版社還推出了林治平主編的《近代中國與基督教論文集》，收入了臺灣地區學者包括前述王樹槐等人所撰的關於基督教史研究的14篇論文。1977年，吳相湘在臺灣《書評書目》第56期上發表了《傅蘭雅與中國近代譯學》的長篇論文，全文分“華蘅芳徐壽建議創設翻譯館”、“譯西書門類——方法與敬業精神”、“譯西書第一要事為名目”、“編製中文科學字彙術語表”、“格致書院與格致彙編”、“主編學校教科書——創設科學書庫”、“啓發中國人的維新思想”、“日本書中譯本粗製濫造的流弊”八個部分，指出傅蘭雅在江南製造局譯述西洋科學技術書籍的工作，上繼利瑪竇譯介西學的餘緒並發揚光大，提示“譯西書第一要事為名目”，並編製中西名目對照表，力求譯名標準化，為近百年來譯學界建立了偉大的指標。他注意普及西洋科學技術於一般社會，對中國人維新思想具有啓發作用，其地位極少人可以相提並論。^②

臺灣學者還非常重視資料的整理和工具書的編纂，如中央圖書館編《近代年來中譯西書目錄》（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8），收錄譯書自清同治六年（1867）至1956年共5047種，以譯自歐美著述為主，也有譯自印度、埃及等國作品，但未收錄日、韓譯作。該目錄依“中國圖書分類法”排列，分總類、哲學、宗教、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史地、語文、美術等類，每一譯書分別標出其書名、譯者、出版時地、出版者及冊數，其下附該書之原著者及書名。由於該目錄中很多轉引自其他目錄，如根據徐宗澤（1886—1947）的《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兵工研究院所藏《江南製造局譯書目錄》、《外交部藏書目錄》、《生活書店全國總書目》、《商務印書館圖書彙報》（部分）、中央圖書館抗戰時期中國戰時出版選目稿本及1956年以後出版之《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等資料，因此無法考訂這些西書中譯本的翻譯出版時間，對於學者的利用受到一定限制。1975年，臺北商務印書館推出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王爾敏所編《中國文獻西譯書目》，系統整理了自上古以迄現代的所有譯文，列出原書名稱與作者、西譯名稱與作者、出版地及出版商、出版年代、卷數或頁數。全書分目錄、思想、宗教、文學、科學、農事、藝術、歷史、地理、教育、社會、經濟、法律、軍事共十四大部分，若干大類還分出子目，所收的原本範圍包括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拉丁文、希臘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蘭文、瑞典文、挪威文、土耳其文、捷克文、保加利亞文，其中以英、法、德三種文字為最多。在他的推動下，臺北華文書局1968年還影印了《萬國公報》、《教會新報》和《中外新聞七日錄》，為研究晚清傳教士的翻譯提供了重要的文獻。

臺灣是一個多種語言交匯的地區，目前僅有從語言政策的角度加以討論，尚無翻譯史角度的專門研究。20世紀60年代後期，臺灣學術界掀起了區域史研究的高潮，臺灣史也成為研究的焦點，並漸漸成為“顯學”。^③雖然臺灣學者在佛典翻譯和近代西學翻譯史研究方面已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可惜有關臺灣地區豐富的翻譯實踐活動至今卻未引起重視。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人們能夠讀到臺灣學者關於臺灣地區翻譯史的系統研究論著。

（七）問世於香港的漢語系統第一部英文漢譯史——《近代翻譯史話》

20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兩岸三地的學術交流受到很大限制，三地學術基本上是

① 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近代化論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0），第89—170頁。

② 吳相湘：《歷史與人物》（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8），第265—286頁。

③ 黃秀政：《臺灣史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2），第1頁。



獨立發展的。中國翻譯史研究在香港也呈現出不同於大陸和臺灣的一些特點，這裏重點討論韓迪厚的《近代翻譯史話》。

1969年，香港辰衝圖書公司徵得香港大學及其作者同意，將韓迪厚1966年在香港大學中文系完成的碩士論文《嚴復林紓傅東華翻譯檢討》以《近代翻譯史話》為題，列入“翻譯理論叢書”出版，署名“香港中文大學進修部編輯”。這是兩岸三地漢語史學界第一本以“近代翻譯史”命名的著作，英文書名為：Moder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A Critical Survey，與中文書名並不相符，顯然是一本有關近代以來中英文翻譯的批評論著。作者韓迪厚出生於書香門第，約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就讀於美國基督教新教教會所辦的燕京大學，本科畢業論文是詩論的研究；50年代在香港曾主編過《今日世界》半月刊；1966年在香港大學中文系獲碩士學位，後任教於新西蘭大學。

《近代翻譯史話》雖問世已四十多年，但至今尚無專文討論過該書的貢獻和不足。該書前有宋淇（1919—1996，筆名“林以亮”）寫的序言，後有四個附錄“香港所見大批珍藏林譯小說目錄”、“中文參考書目”、“參考報章期刊目錄”、“英文參考書目錄”。全書分為五章，將晚清到“五四”八十年間的翻譯史分為1840—1894、1895—1911、1912—1919三個時期。^①第一個時期是“翻譯事業的開端，所譯的多半屬於‘格物’之學”；第二個時期是“翻譯趨向自然科學轉向社會科學”，嚴復的譯書和西洋文學的譯述都開始於這一時期；第三時期“是介紹現代西洋文學的初期，林紓的一百七十餘部譯著，三分之二成於此時”。按照這樣的分期所形成的五章，結構比較刻板。第一章緒論主題為“從戊戌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背景”，類似全書的緒論，分三節對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時期的翻譯作了簡要的回顧：（甲）戊戌維新及政府主持譯書事宜之沿革；（乙）辛亥革命；（丙）五四運動；^②之後是有關嚴復、林紓、傅東華三位的專題研究，先是小傳，然後是譯作及翻譯理論，接下來是對後世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響等。第二章、第三章分別討論了嚴復和林紓兩大譯家。通過對嚴譯的互相比較及其與他人之譯作的比較，將其九種譯作分為“意譯”（《天演論》、《穆勒名學》、《法意》）、“直譯”（《原富》、《群己權界論》、《群學肄言》、《社會通詮》），“自由意譯”（《名學淺說》、《中國教育議》）三組，認為意譯的缺點在適應時代需要，祇求達旨，於“信”似有所虧；直譯則可稱為信、達、雅三善俱備；而“自由意譯”純是報導文字，並未力求工雅。^③在關於嚴譯《天演論》初版的考辨中，該書也有若干錯誤，如認為《天演論》“最早的版本是光緒辛丑年（1901）富文書局的木刻本”^④，其實，目前見到的初版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刊行的河陽盧氏慎始基齋本，此後十多年間，曾發行了三十多種不同的版本。作者對完全不懂外語而翻譯了大量西方小說的林紓給予了很大的同情，對林譯小說有着很中肯的評價，認為那個時代的中國讀者對整個西洋文明毫無認識，因此，必須用東方已有的事物作為接受的鋪墊，去“附會”西洋的觀念，林譯的方式則起到了早期溝通東西文化的職責。作者的這些分析明顯是接受了鄭振鐸《林琴南先生》一文中的觀點，認為林紓打破了傳統中國小說的章回體，使中國文學形式向前大大邁進了一步。^⑤在“同時代的譯者”一節中分別列舉了丁韙良、李善蘭（1811—1882）、蠡勺居士、洪士提反、張赤山、周桂笙（1873—1936）、馬君武（1881—1940）、蘇曼殊（1884—1918）、梁啟超、魯迅、周作人、包天笑、陳鴻璧（1884—1966）、君朔（1867—1943）、周瘦鵠（1895—1968）等譯作，說明這些翻譯大都用文言，所採用的西洋原作有些是從日文轉譯的。^⑥

^{①②③④⑤⑥} 韓迪厚：《近代翻譯史話》（香港：香港辰衝圖書公司，1969），第58、1—6、7—22、11、23—57、58—65頁。



該書在第四章討論傅東華及其同時代的譯作者，這是全書最有獨創性的部分。作者列舉了傅東華的二十七種譯作，並對其中的《詩之研究》、《詩學》、《比較文學史》、《文學概論》、《返老還童》、《生火》、《真妮姑娘》、《美國短篇小說集》和《飄》八種譯作的原文和譯文作了細緻比對，指出“五四”以後的三十年中的英漢譯作，就數目而論，以傅東華為最；介紹西洋文學的理論，傅東華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獨樹一幟；其文學理論著述的翻譯方面顯然勝過其小說翻譯。^①在關於與傅東華同時代文學譯者的討論中，作者列舉了伍光建（1867—1943）、張友松（1903—1995）、趙景深、趙元任（1892—1982）、徐志摩（1897—1931）、洪深（1894—1955）、郭沫若、顧仲彝（1903—1965）、林語堂、劉大傑（1904—1977）、梁遇春（1906—1932）、梁實秋、潘家洵（1896—1989）、田漢（1898—1968）、曹未風十五人，認為研究這些翻譯家的基點是他們對原文的理解。作者從所謂優秀翻譯家的三個條件去衡量：一是對相關的兩個國家文字不但能閱讀瞭解，而且能寫作通暢；二是常識豐富；三是有設身處地的修養。作者將譯者的譯文逐字逐句與原作比對，認為按照上述三個條件，近代中國真正精通中英語言文字的譯者祇有嚴復、胡適和林語堂三人，即使這三位譯界大師的譯品，也是謬誤百出；至於語言學家趙元任、天才詩人徐志摩等翻譯上的錯誤就更多了，如將“厲害”寫成“利害”、“高興”寫成“告興”、“舒服”寫成“舒伏”，“逮耗子”寫成“歹耗子”等；將“物以類聚”（*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譯成“近豬者黑，近麥者白”。並將這些錯誤的出現歸咎於譯者的英文程度差和對於外國知識的缺乏。^②該書對那些精通外語的翻譯家的批評，不免吹毛求疵。因為，上述所列有些僅僅屬於同音字的誤寫，而且讀者很難相信，趙元任、林語堂、徐志摩等人的這些誤譯，是由於英文水平的不夠或缺乏“常識”和“設身處地的修養”。以這些譯品中偶爾的錯譯和筆誤，來討論這些譯家的成敗得失，實在很難令人信服。書中有些論述也缺乏史料依據，如稱伍光建的“英文造詣極深，可惜他的譯作皆用文言，不足以達標時代的主流”^③。其實，伍氏恰恰是晚清以來白話文翻譯的代表。該書的第五章為“結語”，是對翻譯理論與實踐的看法以及今後研究的展望。作者對大陸和臺灣的國人的英文程度進步緩慢表示出深切的憂慮，而“整個的中國語文將因大陸、臺灣和散居海外的國人之間的空間和政治隔膜而日漸分化，正如英文與美文、法國本土的法文與加拿大法文及南非法文的分道揚鑣一樣”。^④

韓迪厚《近代翻譯史話》是一本以翻譯家為考察重點的英漢翻譯史著作，在此一時期可謂獨步一時，堪稱同一時期整體研究中國翻譯史的最高成就。但該書未能真正將譯家譯作放在同一時代的環境中予以細緻的分析，這種將譯文與原文字字句句比對分析的研究方法又恰恰代表了20世紀60年代中國翻譯史研究的取向和水平。

綜上可以看出，20世紀50—70年代，兩岸三地中國翻譯史研究的研究群體學術背景趨於多元化；三十年期間，三地在史學上漸趨有所謂兩岸三地迥然相異的研究風格，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在大陸學術界處在低迷，特別是“文革”時期失去了正常學術研究的狀態下，民國時期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研究的學術傳統在臺港學術界得到了延續，這些翻譯史的著述接續了民國時期翻譯史研究的傳統，將佛典翻譯和西學翻譯重新作為專門論題提出；雖然他們的研究尚不夠系統，但以單行本論著和單篇論文的形式推進了中國佛典翻譯的研究，也對近代西學翻譯史和文學翻譯史詳加討論，其意義實在非同一般。臺港學術界的這些工作既綿延了中國的學術傳統，也開發了新的西方學術傳統。 （未完待續）

^{①②③④} 韓迪厚：《近代翻譯史話》，第69—99、105—109、126—134、101、137—138頁。